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中国应积极主动寻求加入 TPP *

余森杰 张睿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于2016年2月正式签署。而由于其设立的一系列高标准准入条件，自 TPP 谈判伊始，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寻求加入 TPP 的争论便开始出现。本文认为，由于 TPP 谈判成员国占中国国际贸易很大比重，且 TPP 所设立的高标准准入条件与中国国内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和目标一致，中国加入 TPP，不仅可在贸易上获益并促进改革，还可以参与未来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增强在全球贸易舞台上的话语权。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寻求加入 TPP。

关键词：TPP 劳动力成本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 原产地规定

2016年国际贸易多边谈判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莫过于由美国主导的、一共有12个国家参与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下简称 TPP）在2月份的正式签署了。自美国和日本这两大贸易体宣布加入 TPP 的谈判之后，这一跨区域的贸易协定便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除了贸易自由化的各项举措之外，TPP 的亮点还在于其规定了一系列涉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经济环境监管等方面的经济改革要求，符合这些要求的国家才能获准启动加入 TPP 的谈判，因此 TPP 也被普遍认为是高水准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

余森杰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张睿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WTO)。

自 TPP 谈判伊始，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寻求加入 TPP 的争论便开始出现。有人忧虑若加入 TPP，则中国不得不进一步放开一系列行业，从而对国内的就业和企业造成冲击；有人则担忧中国若被 TPP 排除在外，则会丧失大量的出口市场份额，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除此之外，TPP 备受关注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观察人士将 TPP 视为美国“重返亚太”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认为其政治上的目的在于抑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而 TPP 的高标准正是为了阻止中国加入 TPP 而设立的障碍。除了地缘政治方面的考量，中国被 TPP 排除在外，会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出口造成怎样的影响？TPP 的高准入标准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以上问题的答案最终又决定了，中国是否应该寻求加入 TPP。

本文认为，中国寻求加入 TPP，不仅能在贸易和投资上获利，而且也符合中国各项经济领域改革的大致方向和路径，中国应该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主动参与 TPP 谈判，同时推进国内改革。本文首先通过数据揭示 TPP 成员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分析 TPP 成员国在中国全球贸易伙伴中的地位；其次阐述中国目前面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局面，对比在各个出口行业中中国与 TPP 成员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并阐述 TPP 的原产地规定如何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多重关税征收的负面影响；再次分析 TPP 各项准入标准与中国经济改革各项内容的联系；最后部分总结全文。

TPP 对中国对外贸易有多重要？

目前签署 TPP 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新加坡、墨西哥、加拿大、文莱、马来西亚、越南、智利、秘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目前这一阶段，TPP 并不包含中国，这将会为中国的进出口带来怎样的影响？

对于一个地区性的贸易协定来说，成员国的贸易规模决定了这一协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and 重要性。图 1 展示了 2010—2014 年 TPP 总共 12 个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自 2010 起，TPP 成员国总共的出口规模从占世界总出口的 22% 上升到 27%，相应的进口规模也从占世界总进口的 28% 上升到 31%。由于 TPP 中包含了美国和日本两个贸易大国，因此 TPP 在全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此期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也显著上升，到 2014

年底，中国占世界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例分别为15%和12%。因此从体量上看，TPP成员国和中国一起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接近半壁江山，无论中国最终是否加入TPP，都会对全球贸易的格局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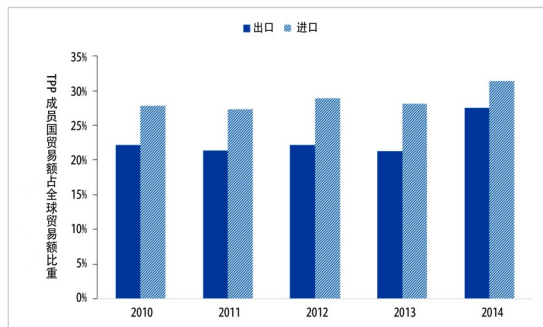


图1 TPP成员国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比重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由于TPP成员国包含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因此TPP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从进出口两方面揭示了TPP成员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的重要地位。图2展示了TPP成员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在中国的总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总体上，对于TPP成员国的出口和从TPP成员国的进口分别占中国总体进出口的33%和30%，TPP影响中国近1/3的全球贸易额。进一步细分不同的贸易产品类型，在出口中，对于TPP成员国的消费品出口占中国消费品总出口的37%，为所有产品类型中最高，其次为资本品（32.5%）和原材料（31%），对TPP出口占比最小的是中间品，但也占中间品出口总额的23%。在进口中，有32%的中间品进口来自TPP成员国。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越来越多公司将生产流程分散到不同的国家，这促成了大量加工贸易企业的产生。而在中国，加工贸易占进出口贸易的相当大比重，因此大量来自TPP成员国的进口中间品，很可能反映了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TPP成员国企业，如技术较为先进的美国、日本企业的生产环节外包，从而形成大量的加工贸易进口。消费品（31%）、原材料（30%）和资本品（29%）进口也占相当大的比重。

总体上来说，TPP成员国对中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大量的中间品进口反映了中国和TPP成员国之间不仅有贸易伙伴关系，还可能存在紧密的价值链上下游关系。一旦这一价值链关系断裂，重新寻找价值链伙伴的成本可能相当大，远高于单纯重新寻找贸易伙伴所需的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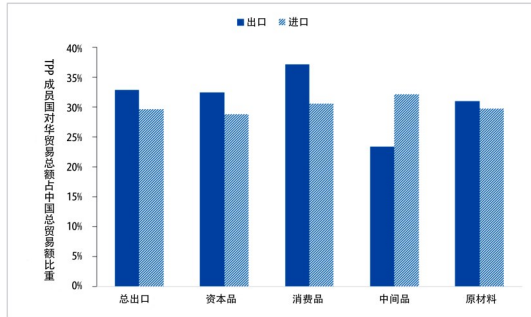


图2 TPP成员国对华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接着对比中国在全球的出口结构与中国对TPP成员国的出口结构。图3显示，中国对全球的出口结构与中国对TPP成员国的出口结构十分相似：资本品和消费品出口均占到40%左右，中间品出口大约在10%~15%之间，而原材料的占比最低，均在1.5%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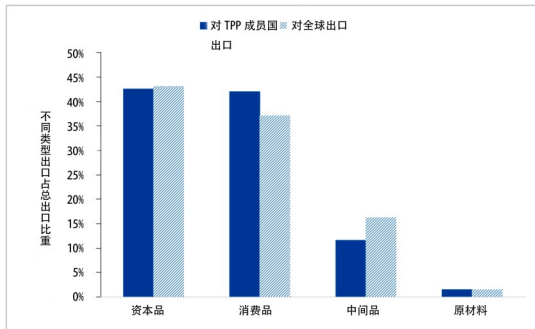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类型出口占总出口比重对比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图4显示进口结构的对比。从TPP成员国进口的产品构成也和中国总体进口状况非常类似：中国的进口主要以资本品（36%）和原材料（26%）为主，中间品（20%）和消费品（11%）的占比较小。进出口结构的相似性反映了TPP成员国是中国全球贸易的一个代表性样本，因此对于TPP成员国的贸易状况变化也能很好地反映中国对全球贸易状况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原材料出口的占比很小，进口的占比则很大。这一方面说明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中国是一个原材料资源较为缺乏的国家，另一方面，TPP成员国如澳大利亚、智利、秘鲁等，则是中国进口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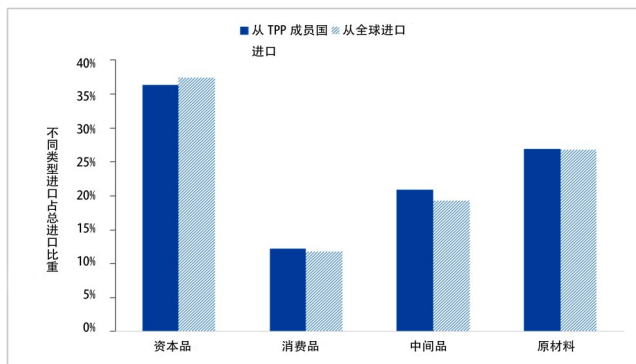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类型进口占总进口比重对比

数据来源：WITS 数据库。

综上所述，由于 TPP 成员国本身贸易体量巨大，占中国在全球贸易额的近 1/3，在各个进出口种类上均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对于中国来说，TPP 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是极其重要的贸易伙伴。

TPP 下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

经过加入 WTO 之后十余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出口部门正在经历一系列的挑战。本节从劳动力成本相对上升、不同部门出口比较优势演化以及 TPP 的原产地规定三个角度，分析中国出口在 TPP 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一) 劳动力成本相对上升

自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对外贸易出口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十余年来快速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在加入 WTO 初期，促进中国出口快速增长的大多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这一现象与国际贸易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相一致：作为一个劳动力相对丰裕且经济体量巨大的国家，在全方面的贸易自由化和关税减免进程中，中国必然会向世界的其他地区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典型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纺织行业为例，其 2000—2005 年出口价值的总增长达到惊人的 250%~300%。^[1]因此在加入 WTO 初期，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快速出口增长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1]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 Wei, 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69–2195.

在工业化初期，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可以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制造业部门面临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而工资成本极低，从而形成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巨大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但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逐渐显现，原本看似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开始逼近甚至达到“刘易斯拐点”，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劳动力需求的上升而上升；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收入的上升也使得制造业工资水平水涨船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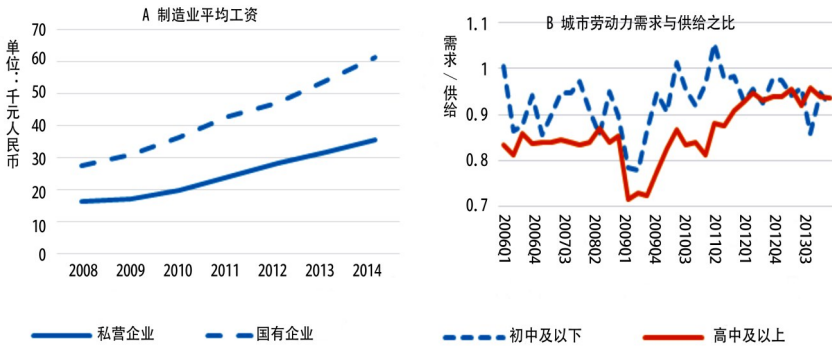


图5 平均工资与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比

注：B图中“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比”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之比，并按相应的教育程度进行划分。若该比例大于1，则供不应求，反之则供大于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教育程度）数据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调查公布。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图5A呈现了自2008年以来制造业中的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各自的平均工资走势，在2008—2014年六年间，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增长了117%和122%，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态势明显；图5B则进一步呈现了不同教育程度的城市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之比，自2006年一季度以来到2014年，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比逐渐走低，到2014年已经从初期的1下跌到0.9。与之相对的，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比则逐渐走高，到2014年已经从初期的0.84上升到接近0.95。图5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经过过去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上，中国已经从过去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情况转变为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状况。而从劳动力供求的结构上，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在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寻求质量升级和价值链攀升，从而转

变劳动力需求的情况。

进一步详细对比过去十余年来中国与 TPP 成员国中其他几个劳动力较为充裕的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水平变化。利用 BVD 数据库中提供的各国工资指数以及 Penn 世界表 8.0 中提供的各国劳动收入份额和就业人数，以 2002 年为基期，计算估计自 2002 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中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和越南五个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计算结果呈现于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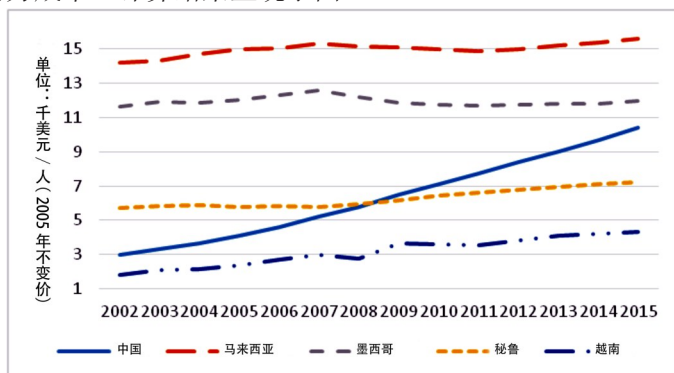


图 6 TPP 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劳动力成本对比

注：劳动力成本的估算方式如下：首先利用 2002 年各个国家的 GDP、劳动收入份额和就业人数计算 2002 年各国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GDP×劳动收入份额/就业人数，以 2005 年不变价美元计价）；之后利用 2002-2015 年的各国工资指数，以 2002 年为基期计算后续每年劳动力成本。

数据来源：BVD 数据库，Penn 世界表 8.0，以及作者计算。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在加入 WTO 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这几个国家中处于很低的水平（人均 3000 美元左右），仅高于越南。而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到 2015 年已经接近人均 11000 美元，远高于越南（低于人均 5000 美元）和秘鲁（人均 7000 美元左右），逼近墨西哥的水平（人均 12000 美元左右）。计算结果显示，从跨国比较的意义上，相对于其他相似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快速上升，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因此相对于上述 TPP 的成员国，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这一类型的产品面临越来越剧烈的竞争，如以往一样单纯依靠低成本的价格优势作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已经不可持续。因此如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出口结构，维持中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中国企业在目前经济转型时期所需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不同行业出口比较优势对比

在中国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形下，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作为一个地区性贸易协定，TPP 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形成关税协定，在协议国之间实行低关税甚至零关税，而在协议之外的国家则无法享受这一关税减免优惠。前面已经提到，TPP 成员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形成关税协定并将中国排除在外，无疑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但究竟哪些行业、哪种类型的产品会受到最大的影响，是需要明确的重要问题。

直观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比较优势的下降，加上关税壁垒的负担，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显然会受到 TPP 的大幅影响。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工资上涨，许多在中国设厂的跨国企业和本国企业面临着产能转移的问题。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能的去向，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转移到内陆的地区省份，二是就近转移到劳动力充裕的东南亚国家，而 TPP 成员国之一越南则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一些案例可以佐证越南正利用其在劳动力禀赋上的优势对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造成威胁：在 2010 年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著名运动鞋品牌耐克最大的外包生产国，而在 2010 年，越南代工厂生产所占的比例达到 37%，超过中国大陆的 34%，成为耐克在全球最大的外包生产国。

而从国家层面上看，一国在某种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可使用巴拉萨所提出的“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这一指标进行度量^[1]，其计算公式如（1）式：

$$RCA_{is} = \frac{X_s^i / X_{total}^i}{X_s^{world} / X_{total}^{world}} \quad (1)$$

其中上标表示国家，下标表示行业。 X_s^i 表示 i 国行业 s 产品的出口额， X_{total}^i 表示 i 国所有行业产品的出口额之和， X_s^{world} 表示全世界各个国家行业 s 产品的出口额之和， X_{total}^{world} 表示全世界各个国家所有行业的出口额之和。 RCA_{is} 本质上是 i 国出口额中 s 行业所占的比例，与全世界出口额中 s 行业所占的比例之比，若大于 1，则意味着若 RCA_{is} 大于 1，意味着 i 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出口行业 s 产品的比较优势，若 RCA_{is} 小于 1 则不具比较优势。首先对比中国和越南在两个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纺织成衣和皮毛制品方面的比较优势。图 7 展示了 2010—2013 年中越两国在这两个行业上比较优势的变化。可以看到，越南在纺织成衣和皮毛制

[1] Balassa, Bel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65, 33, 99 - 123.

品这两个行业上对于中国已经完全占优，之所以中国在这两个行业上还保有巨大的出口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越南本身人口和经济体量较小，因此无力完全蚕食中国巨大的出口市场份额。

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的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继续上升，从长期来看，与其他较低收入的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些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必然会逐渐丧失。此外，TPP成员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因此，当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时，原本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出口会面临相对更高的关税水平这一不利局面，TPP成员国对于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很有可能进一步从中国转移到TPP成员国内部，产生贸易转移效应，进一步削弱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的竞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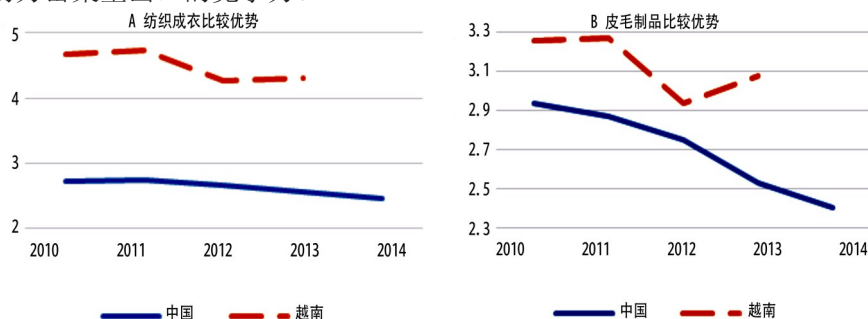


图7 纺织成衣与皮毛制品比较优势

注：由于越南2014年分行业出口的数据尚未公布，因此越南的比较优势数据期间为2010—2013年。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而除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之外，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会不会受到这一协议的影响呢？如前文所述，资本品的出口占中国对TPP成员国出口的33%，因此考察重要的资本品出口：机电产品制造这一行业的比较优势变化。

沿用指标，对比中国和若干在机电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TPP成员国。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行业上是否具有比较优势，其比较优势是否巨大？图8A展示了2010—2014年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相应比较优势变化，从中可以有以下几点观察：第一，在这几个国家中，中国在机电制造行业的比较优势最大，到2014年已经达到2.05左右，而其他国家虽然也具有机电行业上的比较优势，但是与中国还存在差距；第二，虽然中国在这一行业相对而言的比较优势最大，但是其他国家呈现一定的追赶态势，特别是马来西亚，在2014年比

较优势已经逼近2，而作为高端制造业的强国，日本近年来在机电制造行业的比较优势也呈现出上升趋势。比较优势的对比显示，虽然中国目前在机电制造这一重要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但这一优势和其他TPP成员国相比差距并不大，这意味着一旦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相对更高的关税水平很有可能抵消部分中国的比较优势。考虑到TPP成员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在机电制造行业上本身与中国的比较优势差距不大，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情况相似，TPP的形成可能促使TPP成员国对于中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类型上的进口需求转移到TPP内部，使得中国对于TPP的资本密集型出口面临挑战。

进一步从贸易模式考虑，由于中国本身并不是一个资本丰裕型的国家，因此大量的资本品和机电制造出口更可能反映了中国通过承担加工贸易从而融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事实。因此若中国被排除在TPP之外，则可能进一步阻碍中国通过国际贸易与全球各国进行价值链整合的进程，减小加工贸易的知识外溢和技术扩散的作用，阻碍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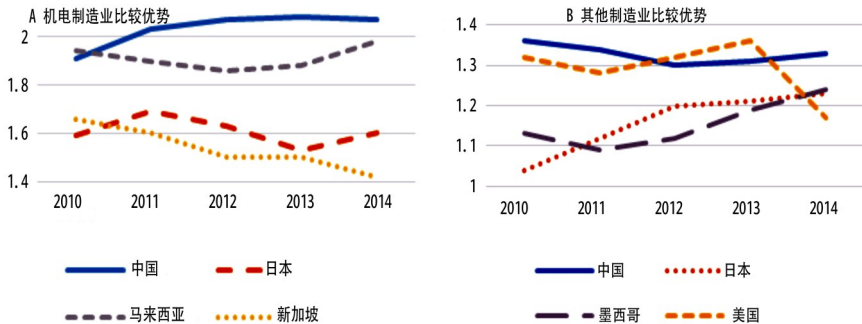


图8 机电制造业与其他制造业比较优势

数据来源：WITS数据库。

进一步考察其他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图8B可以看到，与日本、墨西哥和美国几个TPP成员国相比，中国依然在其他制造业上享有最大的比较优势，但其相对优势并不大；同样的，日本和墨西哥呈现出在比较优势上的追赶态势，因此当面临更高的关税水平时，中国在其他制造业上的相对比较优势也可能遭到侵蚀，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三）原产地规定与多重关税征收

除了常见的关税减免条款之外，TPP还涉及了所谓的“原产地规定”。简单而言，原产地规定要求，若TPP成员国的出口产品想要在TPP内部享受关税减免

优惠，则生产这些出口产品的原材料和各种投入品也须来源于各个 TPP 成员国（或者达到一定的比例）。因此事实上，原产地规定对于 TPP 成员国企业的生产供应决策也提出了要求，企业必须将产品的整个生产链条（或者生产链条的相当大一部分）布局在 TPP 成员国内部，才可以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

这一规定对于中国的贸易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直观地看，原产地规定会对中国的中间品和原材料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若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当 TPP 成员国的企业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或原材料进行生产时，不仅在进口中间品或原材料时面临较高的关税水平，而且由于其不符合原产地规定，当其将产成品出口至其他 TPP 成员国时，也无法享受 TPP 所规定的关税减免，因此相当于对该产品征收了双重关税。图 9 直观地表示这一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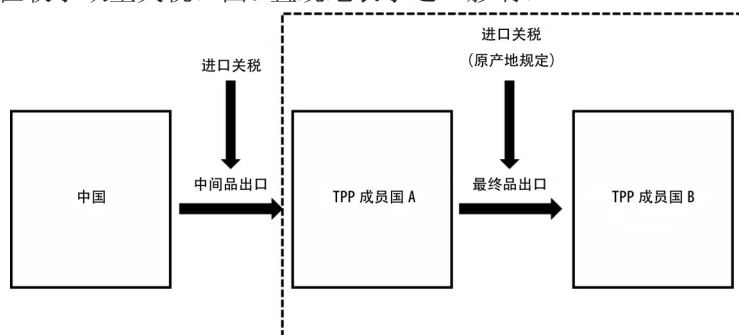


图 9 原产地规定与双重关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TPP 文本内容整理绘制得到。

我们以原产地规定要求出口产品的所有投入品均来自 TPP 成员国为例，简化分析。如图 9 所示，假设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当 TPP 成员国 A 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或原材料）时，会被征收一次进口关税。而当成员国 A 利用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生产产品，并将这一产品出口到 TPP 成员国 B 时，由于该产品不符合原产地规定，因此在出口到 B 国时也会被征收相应的关税。在这一情况下，A 国不仅在进口中间品时要面临（相对于 TPP 成员国内部之间）较高的关税水平，而且在将相应的最终产品出口到另一 TPP 成员国时也面临较高的关税水平。因此，原产地规定使得当 A 国从中国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时，其出口被征收了双重关税，提高了从中国进口中间品（或原材料）进行生产的机会成本，会对中国的中间品（原材料）出口进一步造成负面影响。

而在生产全球化逐渐深化的今天，一个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当生产链条逐渐拉长时，原产地规定的存在会使得生产的关税成本呈代

数级数增加。假定一种产品的生产涉及N个生产环节，分布在N个不同的国家中，且其中的N-1个国家均是TPP成员国，剩余的一个国家是中国，在每个生产环节中均有本地投入。图10显示N=6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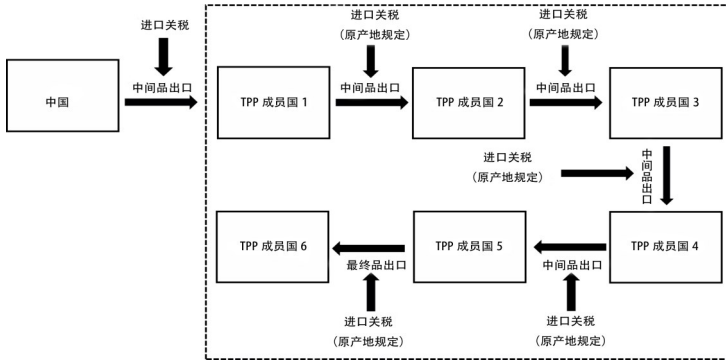


图10 多重关税征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TPP文本内容整理绘制得到。

在图10所示的情况下，生产链条遍布六个国家，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五个国家均为TPP成员国。可以看到，当利用中国的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时，由于不符合原产地规定，在产品的生产和最终产品的销售环节中，总共会被征收六次进口关税，大大提高了从中国进口中间品进行生产的机会成本。因此随着生产环节的增多，利用来自中国的中间品（原材料）进行生产所引起的关税机会成本会越高，在被征收多重关税的情况下，TPP中的原产地规定对于中国中间投入品（原材料）出口的负面效应也就相应越大。

中国对TPP的中间品出口占中国所有中间品出口的23.5%，而对于TPP的原材料出口也占中国所有原材料出口的31%。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局布局生产，价值链的分割和外包愈发普遍。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TPP中的原产地规定通过多重征收关税，抬高关税成本，从而削弱各个TPP成员国使用中国生产的中间品和原材料，以及跨国公司在华外包生产环节的动机，进一步影响中国对于TPP成员国的出口。

综上所述，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出口上，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目前面临着比较优势的丧失，与部分TPP成员国相比甚至处于劣势；而在资本密集型和其他产品的出口上，中国虽然目前相对于TPP的成员国具有相对的出口比较优势，但优势并不大。由于与TPP成员国间的贸易占中国与全球贸易总量的1/3左

右，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由此产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可能使得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雪上加霜，竞争力进一步削弱；同时也可能使得中国相对于 TPP 成员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其他产品上的比较优势缩小甚至消失。此外，原产地规定的存在使得 TPP 成员国在利用来自中国的中间品和原材料进行生产时会受到双重甚至多重关税的制约，提高利用中国中间品和原材料以及在中国进行外包生产的机会成本，进一步从价格方面削弱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因此当中国被排除在 TPP 之外时，在目前外需波动性增大、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下，将进一步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比较优势的丧失，在中长期，这可能引起大量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将工厂迁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资本的撤离不仅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造成贬值压力，也会减少国内的生产资本存量，减少就业岗位，阻碍中国加入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工，从而对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中国应该寻求加入 TPP。一方面，加入 TPP 能避免可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于出口和经济社会的负面效果，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又能进一步分享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果实，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另一方面，加入 TPP 还能增强中国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话语权和制定权，对于中国在后 WTO 时期的全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添上重要砝码。

TPP 与中国的改革路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以上论述主要关注 TPP 在出口方面对中国的可能影响。而除了自由贸易所关注的关税减免，TPP 还涉及贸易便利化、国有企业与垄断力量、知识产权制度安排、市场准入、环境保护等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条款要求。目前外界对中国加入 TPP 的主要顾虑便来自于 TPP 所设立的这一系列高标准的准入要求，其中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条款更是被认为是为了将中国排除在 TPP 之外而设立的。据此许多人也认为 TPP 是美国“重返亚太”、从经济上遏制中国的一项举措，旨在限制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扩大的经济影响力。

但笔者认为，若从长期的角度考虑，TPP 所设定的这一系列要求，实质上与中国各项改革的大方向和目标一致，因此与其将其视作为了阻止中国加入 TPP 而设立的绊脚石，不如将其视作推动国内改革的契机，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在各个经济领域的改革，从而为迎接未来更高标准的全

球贸易和经济规则体系做好充分准备。接下来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TPP及其与中国目前改革方向的联系。

(一) TPP与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

作为一项区域性的贸易协定，TPP与中国已经完成谈判的或者正在谈判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1]以及已在国内上海、广东、福建和天津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均有一定的联系。除了关税削减这一贸易自由化举措之外，TPP与其他自贸协定和自贸区改革措施在贸易便利化、投资等方面也有相似的覆盖范围。

1. 贸易便利化

TPP文本的第五章涉及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的改革措施。贸易便利化的内涵包括了简化进出口的通关手续，降低通关过程耗费的时间和费用，提高海关执法的透明度，加强不同国家海关部门的协作以建立高效一致的通关管理制度等。目前中国的贸易便利化程度在世界上还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2]繁琐的通关手续以及随之而来的贸易成本对于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从实际操作上看，贸易便利化作为降低企业进出口成本的举措，也属于广义的贸易自由化范畴。

而近年来，无论是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等贸易伙伴所签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是中国在上海、广东等地所建立的自由贸易区，均把贸易便利化作为重点内容。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上海自贸区已经推行海关执法的清单式管理以提高执法透明度；同时推行的一站式申报查验通关制度也旨在提高通关效率，减少消除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和管理成本，最大程度地简化通关流程。在中国与其他国家所签署的自贸区协议如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和中国—韩国自贸区，也同样有专门关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相应条款。从长远来看，提高各国海关之间的协作，促进贸易便利化是大势所趋，而中国在这方面也已经开始积极应对采取改革措施，降低通关成本。

2. 投资

TPP文本的第九章则主要规定了与投资相关的内容。在生产全球化日益深化

[1] 如已经签署的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韩国、中国—东盟等自贸协定，以及正在谈判中的中日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贸协定。

[2] 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的营商指数调查（Doing Business），中国在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跨境贸易”（Trading across Borders）这一项目中排名世界第96位，在进出口通关时间和通关费用上均远远高于OECD发达国家的水平。

的今天，许多企业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投资设厂或并购，或进入当地市场，或寻找生产要素，或寻求战略资源，从而使得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得到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制定符合国际通用惯例的监管实践，是各国政府在吸引全球投资资金时的重要考量。TPP 要求投资企业享有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保证投资企业免受非正当的征收、技术本地化等要求，并保证企业可自由转移投资资金。同时其倡导的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事实上也要求一国市场应当向外国投资者充分开放。

而在中国的自贸协定和自贸区的改革实践中，也涉及对于外资准入和外资企业监管等的规定。同样以上海自贸区为例，上海自贸区也采取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管理模式，以提高管理的开放度和透明度。而进一步地，投资企业可自由转移投资资金的要求，又与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这一议题相联系。人民币在 2015 年年底加入 SDR，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而若今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上升，人民币国际化会进一步深化，这也会对资本账户的管理和开放提出更高的要求。

过去三十年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因此改革对于投资活动的监管实践，进一步塑造公平高效的投资管理制度，是中国改善投资营商环境，从而在未来继续利用全球资金实现自身增长潜力的必然选择。

（二）TPP 与供给侧改革

从经济学的基本面来说，“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实现中国经济在长期的持续快速发展，根本上还需要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剩、劳动力和资本要素配置存在扭曲、企业缺乏创新等问题，中国政府提出要进行“供给侧改革”，以实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优化经济结构、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 TPP 涉及一系列关于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垄断企业、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这些方面的要求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也有共通之处。

1. 国企改革和市场化

TPP 文本第十五章规定了和政府采购有关的内容，要求各国对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做出国民待遇和非歧视两大原则的承诺；第十六章涉及竞争政策，旨在确保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并立法禁止限制竞争的行为；第十七章则涉及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企业的规制，要求对于主要从事商业活动的大型国有企业，要确保国有企业以商业考虑为基础做出交易决定，除非这些决定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相

悖。同时也要求各国政府不能通过对本国国有企业提供非商业帮助从而损害其他企业的利益。一句话，TPP要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均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中公平竞争。而这些条款的要求在中国均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密切相关。

对于中国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一向是重中之重。对于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中国一直致力于通过各种改革举措（如不良资产剥离、股份制改革、股权分置改革等）以加强国有企业的市场化程度，同时放开竞争性产品市场，使得国企和私企都可以参与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从2015年公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可以看出，通过国企改革，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国企深化改革的大方向。

而供给侧改革强调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去产能，去库存，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和国企深化改革的着力点也相一致。以往的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生产率明显低于私营企业。^[1]但是目前在中国，大量国企能够以低成本获得各种生产资源，而私营企业却在这方面存在困难。典型的例子是国有企业往往拥有所谓的“预算软约束”，能够以低廉的成本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而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则面临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成本高企，有时甚至不得不借助于风险较大的非正规金融融资途径如民间借贷等，从而放大了金融风险。因此在目前的要素市场上，生产资源的配置还存在着一定的所有制歧视现象。消除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要求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能公平竞争。这在一方面可以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能够获得资源，淘汰落后产能，改善资源配置，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中国在各个行业的总体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竞争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激励国有企业改善自身运营模式，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整个国有企业部门的竞争力。因此，TPP中关于国有企业和竞争政策的重要条款，和中国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也相一致。

2. 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创新

TPP文本的第十八章涉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涵盖专利、商标、版权、工业设计、地理标识、商业秘密以及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TPP成员国将提供包括民事

[1] Hsieh, C. T., & Klenow, P. J.,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4), 1403–1448; Khandelwal, A. K., Schott, P. K., & Wei, 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Embedded Institutional Reform: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6), 2169–2195.

程序、临时措施、边境措施以及针对商业规模的商标假冒和侵犯版权等行为采取刑事程序和惩罚等的执法体系，采取法律措施防范商业秘密的盗用。对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会促进自主创新，提高创新产出，从而提高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过去三十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实现粗放式增长，由于过去中国在大多数行业均落后于世界前沿水平，因此可以利用后发优势，通过对已有的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提高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而当一个国家逐渐趋近世界的技术前沿时，其后发优势会逐渐消失，自主创新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拉动作用则逐渐凸显出来。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保证了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知识产权保护所赋予的发明者对于产品的专有权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激励机制，为持续不断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目前中国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大幅减少以往常见的剽窃、抄袭、盗版等现象，则是推行这一政策的基本前提。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各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增长模式已经逐渐从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既是为了形成有益于自主创新研发的土壤，也是为了中国在达到世界技术前沿之后的持续发展未雨绸缪。因此 TPP 所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要求，对于中国鼓励自主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有重要意义。

（三）TPP 与环境保护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短期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经常被提及。环境保护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TPP 文本的第二十章对于环境保护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包括共同应对污染、过度砍伐、过度捕捞等行为，建立更加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中国，环境污染在近几年成为最受关注问题之一。一方面，由于早期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对于工业生产在环保方面的规制一直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一些地区也出现通过降低环保标准以吸引外资的“逐底行为”（race to the bottom），以追求短期经济效益最大化，因此引起环境污染以及相应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生产能源结构亟待优化，目前依然依赖煤炭等能源为主进行火力发电，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空气质量问题，对人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严格执行环保标准以规制工业生产的过程，另一方面需要优化目前的能源使用结构，向清洁能源转型，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这不仅是 TPP 条款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分析,可以看出,虽然 TPP 制定了一系列较高的准入标准,在目前看来中国似乎并不具备加入的全面条件,但细细分析之下, TPP 的主要准入标准,与中国目前的改革大方向不谋而合。TPP 许多方面的准入条件,某种程度上代表了 WTO 之后的全球和地区性贸易协定的发展潮流:在关税壁垒减免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消除非关税壁垒,统一市场准入规则,明确各项监管制度的实践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加入 TPP 的谈判中来。一方面,由于加入 TPP 的谈判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以我为主”意味着以加入 TPP 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国内的各项改革措施,优化经济结构,为适应未来更高标准的全球贸易和经济规则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为我所用”则是在充分利用 TPP 的高标准要求推动国内各项改革,从而符合标准加入 TPP 之后,进一步享有 TPP 所规定的各项贸易和投资开放条件所带来的贸易投资全球化红利,可谓一举两得。

结 论

自 21 世纪以来,加入 WTO 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强劲的外部需求,从而使得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劳动力丰裕的比较优势,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在劳动力成本上涨、外需不确定性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的宏观形势下, TPP 的出现既为中国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机遇。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寻求加入 TPP。一方面,鉴于目前中国与 TPP 成员国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3 左右,加入 TPP 令中国可以进一步享受成员国之间相互的关税减免,避免原产地规定所带来的多重关税征收效应,减缓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丧失进程,并进一步维持资本密集型和其他制造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保持出口额的平稳增长;另一方面,由于 TPP 的准入条件与中国许多改革的重要内容相一致,因此中国应该本着“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利用 TPP 的契机,进一步深化国内各个方面的改革进程,同时也可以享受 TPP 所带来的贸易和投资红利,这从根本上也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更重要地, TPP 代表了未来经济合作协定的发展潮流,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熟悉未来国际贸易投资的规则,并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争取话语权,这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相一致。■

China's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licy

Editorial Department

9

How will the Chinese economy fare in 2016 and 2017? Is China trapped in deflation now? Should China put priority on reform or fiscal stimulation? What are the crucial reform measures? How can China carry them out? High-profile economists, such as Yu Yongding, member of the academic board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ang Yiping, professor of th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will offer their insights on the topic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and policy.

Make TPP Work for China: China Should Seek to Join TPP

Yu Miaojie and Zhang Rui

39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whose negotiation process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as officially signed in February 2016. Due to a series of strict requirements to join the TPP, debates about whether China should seek to join it have emerged ever since the negotiation began. We argue that, on the one hand, China can enjoy favorable tariff treatments by joining the TPP because the current TPP members account for a large portion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rict requirements of the TPP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orientation and objectives of China's domestic reforms. Therefore, by joining the TPP, China can not only benefit from further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catalyze domestic reforms, but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and improve its influence.